

商摇君摇书

[秦] 商摇鞅摇著
摇摇 纪有志摇译

目 录

前言	(远蒙)	修权第十四	(远原)
更法第一	(远缘)	徕民第十五	(远愿)
垦令第二	(远范)	刑约第十六 (亡佚)	(远蒙)
农战第三	(远远)	赏刑第十七	(远蒙)
去强第四	(远远)	画策第十八	(远缘)
说民第五	(远范)	境内第十九	(远原)
算地第六	(远原)	弱民第二十	(远原)
开塞第七	(远蒙)	御盗第二十一 (亡佚)	(远范)
壹言第八	(远蒙)	外内第二十二	(远愿)
错法第九	(远蒙)	君臣第二十三	(远范)
战法第十	(远蒙)	禁使第二十四	(远范)
立本第十一	(远范)	慎法第二十五	(远原)
兵守第十二	(远原)	定分第二十六	(远范)
靳令第十三	(远蒙)		

前摇言

商鞅（约前 390—前 338），是我国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是一位卓越的政治改革家、思想家、军事家。

他是卫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卫鞅，或公孙鞅。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后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孝公六年（公元前 354 年）任左庶长，实行变法。主要内容是：建立联保组织，实行连坐法；废除贵族的世禄制，奖励军功；重农抑商，推行农战等。当时太子犯了法，卫鞅就处罚了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孝公十年（前 344），变法初见成效，卫鞅被提升为大良造。

孝公十二年（前 340），卫鞅将秦国都城从雍（今陕西凤翔县南）迁到咸阳（今咸阳东北），并开始第二次变法。其主要内容是，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准许买卖；合并乡邑为县，设置县令；统一按田亩数征收租税；不许男女老少同居一室；统一度量衡等。经过变法，秦国日趋富强。孝公十六年，公子虔又犯了法，被割去鼻子。秦孝公二十二年（前 344 年），卫鞅攻魏取得胜利。因战功封于於（今河南内乡东）、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号商君，因称商鞅。孝公死后，被贵族诬害，车裂而死。

商鞅的政治思想和变法改革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商鞅的政治改革推动了时代的发展，不但强大了秦国，兼并了六国，也开创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社会制度。

《商君书》共有二十六篇，其中二篇有题无文，现存二十四篇。一些学者考证，认为该书大部分是商鞅的遗著，但其中也被编入了少许他人之作。《商君书》是先秦时期法家的重要典籍。《商君书》反映了商鞅的政治思想，即以法治为主体，以农战为要务，以刑罚为手段，以反儒为辅助，以富强为宗旨，以称王为目的的改革变法理论。

更法第一

摇摇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摯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张）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惊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于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熟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摯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

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夏、殷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吝，曲学多辨。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

于是遂出垦草令。

【译文】

秦孝公研讨治国大计，公孙鞅、甘龙、杜摯三位大夫在孝公跟前侍候。他们考虑社会情况的变化，探讨整顿法制的根本，寻找役使百姓的方法。

秦孝公说：“替代先人被立为国君后，没有忘记国家的兴盛，这是当君主的道德准则；实行法治而积极弘扬君主的权威，是做臣子的行为准则。现在我想改变法度来治理国家，更改礼制来教导百姓，但是又怕引来天下的人对我议论啊。”

公孙鞅说：“臣听到这样的话：‘犹豫不决的行动不会取得成功，迟疑不定的做事不会取得效果。’国君尽快拿定变法的大计，还是不要去顾忌天下人对您的议

论。况且具有异乎寻常行为的人，本来就要被世俗社会所非议；具有独特见识的人，常常会遭到民众所嘲笑。有一句俗话说：‘愚笨的人对于已成的定局的事也看不出来，而聪明的人却能在事情发展的萌芽状态就看出苗头来。民众，不可以和他们策划事业的开端，只可以和他们同庆事业的成功。’郭偃的法书说：‘追求最高道德的人不去与世俗附和，而要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去和群众商量。’法度是为了爱护人民的，按照礼制办事是为了便于成事。因此，圣人只要能强国，就不去效法那旧的制度；只要有利于百姓，就不去死守那旧的礼制。”

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对！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圣人是不改变民众的礼俗来进行教化，智者是不搞变法来治理国家的。’顺着民众的习惯来进行教化，不费功夫而功效就明显；依据原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官吏既习惯而民众又安宁。现在如果要改变法度，不按照秦国的旧法办事，要改变旧的礼制来教化民众，臣怕天下的人都会议论甚至笑话国君，希望请您多加考虑才是！”

公孙鞅说：“您所谈的，是社会世俗人的言论。平庸人安于旧的习惯，学究为他们的有限的见闻所束缚。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维护旧法制，而不能跟他们讨论变法革新的事。夏、商、周三代，礼制虽不同，但都可以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的法度不一样，但都能称霸诸侯。所以只有聪明的人能够制定新的法度，而愚昧的人却墨守旧法；贤能的人懂得改变礼制，而不贤的人们却拘泥于礼制。跟拘泥于旧礼的人是不值得商议政

事；和墨守旧法的人，是不值得谈论变法的。国君请您不要再疑虑了。”

杜挚说：“臣听说过这样的话：‘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变更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更换新的工具。’我还听说过：‘取法古代的法制，是没有过错的，按照古代的礼制办事不会有偏差。’请国君还是应该好好考虑啊！”

公孙鞅说：“过去的朝代教化都不一样，该效法什么古法呢？古时的帝王的做法也不是一再因袭，我们又以谁的礼制为准呢？伏羲、神农，是重教化而不加杀戮的。黄帝、尧、舜，只惩处犯法者而不罪及他的家属。到了后来的周文王、周武王的时候，他们各自按照实际情况立法，按需要而制礼，礼法是因时而定的，制度政令都是适合实际的，连兵器、铠甲、器具、设备，也都是适于使用的。所以我要说：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只要有利于国家的事就不必效法古代。像商汤、周武王的称王天下，正是没有遵循古法而兴盛起来的；而商朝、夏朝的覆灭，正是因为商纣、夏桀不变换礼制才灭亡的。这样看来，不按古法办事的人，未必应受指责，而遵循古代礼制的人也不值得肯定。国君不要再为是否变法的事疑惑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偏僻里巷中的人们遇事往往少见多怪，一知半解的学士常好发生争辩。愚昧的人所高兴的事，聪明的人却为它悲哀；狂妄之徒所欢乐事，贤能的人却为它忧伤。有些人用拘泥于世俗的偏见来发议论，我不为他们的说法而犹豫了。”

于是就颁布了开垦荒地的命令。

垦令第二

摇摇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余日。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败；农不败而有余日，则草必垦矣。

訾粟而税，则上一而民平。上一则信，信则臣不敢为邪；民平则慎，慎则难变。上信而官不敢为邪，民慎而难变，则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则壮民疾农不变，壮民疾农不变，则少民学之不休；少民学之不休，则草必垦矣。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不殆；民不贱农，则勉农而不偷。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

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贱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使商无得余，农无得耒。农无得耒，则窳惰之农勉疾；商不得余，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一。意一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

无得取庸，则大夫家长不建缮，爱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无所于食，是必农。大夫家长不建缮，则农事不伤；爱

子惰民不窳，则故田不荒。家事不伤，农民益农，则草必垦矣。

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一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农不能喜酣□，大臣不为荒饱。商贾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酣□，则农不慢；大臣不荒，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

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狼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谏、恶心之民无变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则草必垦矣。

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农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心躁欲之民一意，则农民必静。农静，诛愚乱农之民必农，则草必垦矣。

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概。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则余子不游事人，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

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则奸谋无所于伏盗。输粮者不私，轻惰之民，不游军市。盗粮者无所售，送粮者不私，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国粟不劳，则草必垦矣。

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过举。过举不匿，则官无邪人。迂者不饰，代者不更，则官属少而民不劳。官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败。官属少，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

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

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农逸则良田不荒，商劳则去来赅送之礼，无通于百县，则农民不饥，行不饰。农民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农事必胜，则草必垦矣。

令送粮无取傲，无得反庸，车牛舆重设必当名，然则往速徠疾，则业不败农。业不败农，则草必垦矣。

无得为罪人，请于吏而饷食之，则奸民无主。奸民无主，则为奸不勉，则农民不伤，奸民无朴。奸民无朴，则农民不败。农民不败，则草必垦矣。

【译文】

不准官吏留下当天的公事，那么邪恶的官吏也就来不及到民众那里去为自己谋取私利了。而众多官吏的公务不会相互拖拉积压，那么农民就会有充足的时间去从事农业劳务；邪恶的官吏来不及到民众那里去谋取私利，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损害。农民不受害，又有了充足的时间从事农务劳动，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估算粮食的产量来征收土地税，那么君主的地税制度就能统一而农民的负担就会公平了。君主的地税制度统一，就有了信用；有了信用，那么臣下就不敢搞不正当的收税。农民的地税负担公平合理，就会慎重地看待自己的职业；慎重地看待自己的职业，就不会轻易弃农改行。君主有了信用而官吏不敢搞不正当的税收，农民慎重地看待自己的职业而不轻易地去改变它，那么民众就不会认为君主不对，而心中也不会怨恨官吏。民众不认为君主不对，心中也不怨恨官吏，那么壮年人就会积极务农而不再改行。壮年人积极务农而不改行，那么青年人就会学习壮年农民而不断地从事农业劳动。青年人学习壮年农民而不断地从事农业劳动，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不要因为谁有国外的势力而就给谁封爵位给官做，那么民众就不会看重那些所谓学问，也不会轻视农事。民众不看重那些所谓学问，就会愚昧无知；愚昧无知，就不会同外国交往；民众不同外国交往，那么国家安全没有危险。民众不轻视农事，就会尽全力务农而不偷懒。国家安全没有危险，民众全力务农而不偷懒，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达官贵族的俸禄高和收税多，不劳动吃闲饭的人成群，这是有害农业生产的事。所以要按照他们吃闲饭的人口的数目来征赋税，并加重他们的徭役。这样，那么达官贵族就不会多收食客，因而那些行为游荡、好吃懒做的人就没有地方混饭吃。这些人没处混饭吃，就必然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不准商人卖粮，不准农民买粮。农民不得买粮，那么懒惰的农民就会勤奋耕作。商人不得卖粮，那么在丰收年景就不

能囤积粮食而更加快乐，在荒年也没有暴利可得。没有厚利可得，那么商人就害怕经商了；商人害怕经商，就想去务农。懒惰的农民勤奋耕作，商人想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声色玩好、奇装异服不准流行到各县去，那么农民劳动时就看不到奇装异服，在休息时就听不到靡靡之音。在休息时听不到靡靡之音，那么精神就会振作；劳动时看不到奇装异服，那么思想必然会专一。农民思想专一而精神振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不准雇取佣工，那么大夫家长就不能大兴建造修缮之风，他们溺爱的子女就得劳动而不能光吃闲饭，懒汉也不能再偷懒，而做雇工的人也就没有地方混饭吃，这样的话，他们就一定会去务农。大夫家长不兴建造修缮之风，那么农业生产就不会受到妨害。大夫家长溺爱的子女和懒汉不再偷懒，那么原有的田地就不会荒芜。农业生产不受到妨害，农民和做雇工的人都更加努力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不许开办旅馆，那么奸诈诡伪、急攻求利、私下勾结、不安心农业生产的人就不能远行，而开设旅馆的人也就无法谋生了，那么他们就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去务农，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林湖泊的资源，那么厌恶农业劳动、懈怠懒惰、贪婪无厌的人就不能再靠山林湖泊任意砍柴、采矿、打猎、捕鱼。这些人没有地方混饭吃，就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国家提高酒、肉的价格，加重对酒、肉的税额，让税额高成本的十倍，这样的话，那么卖酒、肉的商人就会减少，农民也就不能再过分嗜酒畅饮，大臣也不会再

荒废公务而沉醉在吃喝玩乐里。卖酒肉的商人减少了，那么国家就不会浪费粮食；农民不再过分嗜酒狂饮，那么农业也就不会荒废。大臣不荒废公务和醉饱，那么国家的公事就不会拖延积压，国君就不会有错误的措施了。国家不浪费粮食，农民不放松农活，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加重刑罚并实行连坐法，那么心胸狭窄、性情急躁的人就不敢私斗，凶暴蛮横，强悍刚烈的人就不敢再争吵，懒惰的人就不敢再游手好闲，挥霍钱财的人就不会出现，花言巧语、阿谀奉承而存心不良的人就不敢耍花招骗人了。这五种人在国内没有了，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命令民众不得擅自迁移，那么他们就会愚昧无知，那么不安心务农的人就没有什么地方能混饭吃，那就必定会去务农。愚昧无知、急于求利的人都能专心一意地务农，那么农民就一定会安居乐业。农民安居乐业而愚昧无知，必定专心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同样地制订颁布有关嫡长子以外的贵族子弟担负徭役的法令，按照辈份大小服役，并且提高他们免除徭役的条件，由掌管称量粮食的官吏按规定标准发给口粮。他们不可以逃避徭役，而想做大官还不一定能当成，所以这些贵族子弟就不可能外出投靠豪门侍奉权贵，那么就必然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不准国家的大臣和大夫们，追求芜杂的典籍古籍、诡言巧辩、外出周游寄居他乡的事情，更不准到各县去闲居游逛，那么农民无处听到奇谈怪论、看到奇异的方术技能。农民无处听到奇谈怪论、无处看到奇异的方术技能，那么聪明的农民无从离开原来所从事的农业，而愚蠢的农民也就愚昧无知，不会爱好学问。愚蠢的农民

愚昧无知，不爱好学问，那就会积极地干农活。聪明的农民不离开农业，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命令军队内部的集市上不准有女子；又命令军市中的商人，让他们每人自备铠甲兵器，使他们时刻注意军队作战军需的供求；又使军市上不准有私运粮食的人。这样的话，那么奸巧的计谋就无处隐藏，偷运粮食的人就不能私下贮藏，轻浮懒惰的人就不会到军队内部的集市上去游逛。偷盗粮食的人无处出售，运送军粮的人一律由公家派遣，轻浮懒惰的人不游逛军人市场，那么农民不放荡，国家的粮食也就不会浪费，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各县的政治措施必须一致，那么升迁的官吏就不能美化自己，新上任的官吏也不敢改变统一的制度，有过错而被免职的官吏也就不能隐瞒自己的错误行为。官吏的错误不能隐瞒，那么当官的就不会有邪恶的人了。升迁的官吏不能美化自己，新上任的官吏不敢改变制度，那么从属官员就可以减少，那么农民就不会有过重的负担。官吏没有邪恶的行为，那么农民就不会四处奔走游荡；农民不四处游荡，那么农业就不会受到妨害。官吏属员减少了，那么征税就不会多。农民没有过重的负担，那么务农的时间就多了。务农的时间多了，征税不多，农业不受妨害，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加重关口和集市上的商品税，那么农民就不愿经商，商人就会有怀疑松劲的情

绪。农民厌恶经商，商人疑惧懒得经商，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按照商人家中的人口多少摊派徭役，命商人家中劈柴的、赶车的、服役的、当僮仆的种种奴仆必须到官府登记注册，并按照名册轮到谁名下，谁就去服徭役，那么农民就安闲，而商人就劳苦了。农民安逸，那么良田就不会荒芜；商人劳苦，那么就没有余力把那些往来赠送的礼品贩运到各县。这样的话那么农民就不会挨饿，办事也不会讲排场。农民不挨饿，办事不讲排场，那么他们对公家的事就做得快，而私人的事情也不耽误，这样农业就必定兴盛。农业必定兴盛，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规定给官家送粮食时不得雇用别人车子，运送粮食的车子不准在返回途中受雇给人家私载货物，车子、拉车的牛、所载粮食的重量在服役时必须和官册登记时一样。那么送粮的车子去的飞快回来迅速，这样的话，送粮的工作就不会妨害农业生产。送粮不妨害农业生产，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不准向官吏请求允许为犯罪的人送饭吃，那么邪恶的人就没有了主张。邪恶的人没有了主张，那么为非作歹就得不到鼓励，农民不受伤害。为非作歹得不到鼓励，是因为邪恶的人没有了依靠。邪恶的人没有依靠，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农民不受到危害，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农战第三

摇摇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一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一空出也，则作一。作一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仓廩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一。民朴一，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则奸不生，奸不生则主不惑。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进则曲主，退则虑私。所以实其私，然则下卖权矣。夫曲主、虑私，非国利也，而为之者，以其爵禄也；下卖权，非忠臣也，而为之者，以末货也。然则下官之冀迁者，皆曰：“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尔，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则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迁，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货以事上，而以求迁乎？”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仓虚、主卑、家贫，然则不

如索官。”亲戚交游合，则更虑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

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一，故民不营私，则国力转。国力转者强，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则国治，一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一而已矣。

今上论材能知慧而任之，则知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一，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如此，则民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好辩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圣人明君者，非尽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

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懵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情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

破也。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今夫螟、螽、蝗、蠲，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乏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为螟、螽、蝗、蠲亦大矣！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犹无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术也。故先王反之于农战。故曰：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故诸侯挠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则无及已。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一则少诈而重居，一则可以赏罚进也，一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持也，是以圣人作一，持之也。国作一岁者，十岁强；作一十岁者，百岁强；修一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君修赏罚以辅一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

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国危主忧，说者成伍，无益于安危也。夫国危主忧也者，强敌、大国也。人君不能服强敌，破大国也，则修守备，便地形，持民力，以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一，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一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持也。

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说者成伍，烦言饰词，而无实用。主好其辩，不求其实。说者得意，

道路曲辩，辈辈成群。民见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学之。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小民乐之，大人悦之。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游食者众则农者殆，农者殆则土地荒。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离上，而不臣者成群。此贫国弱兵之教也。夫国庸民以言，则民不畜于农。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国作一，持之于农而已矣。

【译文】

国君用来鼓励民众的，是官职和爵位；国家赖以兴盛的，是靠农耕和作战。如今民众取得官职爵位，都不是靠农耕和作战，而是靠巧妙的言论和空虚的说教，这就只能毒害民众。加害于民众的国家必然没有实力；没有实力的国家必然会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他教育民众都专心从事农战来取得官职和爵位，所以不专心从事农战的人，就不能做官、没有爵位。国家废除巧言空谈，那么民众就朴实；民众朴实，就不会放荡。民众看到君主的爵禄奖赏只能从事农战这一个关口通道得到，那就会专心从事农战了；民众专心从事农战，那就不会弃农而谋求其他行业了；民众不谋求其他的行业，那么国家就实力雄厚；实力雄厚，那么国家就强大。现在国境内的民众都这样议论说：“农耕和作战可以逃避，而官职和爵位照样可以得到。”所以那些社会上才能出众的人都要改行，而去努力学习《诗》、《书》，追随外国势力，这样，上等人位居显赫，中等人也可以得到一官半职；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就去经商，搞手工业，以此来逃避农耕和作战。具备了上述

情况，国家就危险了。民众都以上述这两种人的行为作为效法的对象，国家就必然会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虽然粮食满仓，对农业也不可忽视；国家大、人口多，对空谈也不放任自流，这样，民众就朴实专心农战。民众朴实专心农战，是因为官职和爵位不能用巧诈的空谈来取得。官职、爵位不能用巧诈的空谈来取得，那么奸诈的人就不会产生。奸诈的人不会产生，那么君主就不会被迷惑了。现在国内的民众以及据有官职、爵位的人，看见朝廷上可以用巧诈的空谈、动听的游说来取得官爵，所以官爵的授予就违背了正常的法规。因此，他们上朝就曲意逢迎君主，退朝回家就图谋私利、琢磨自饱私囊的方法，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就在下面就肆意用权。曲意逢迎君主而图谋私利，是有害于国家的，然而他们要这样做，是为了爵高厚禄；在下面肆意用权，就不是忠臣，然而他们要这样做，是为了追求钱财。这样的话，那么下级官吏中那些希望高升的人都说：“只要钱财多，那么高官厚禄就有希望了。”又说：“我不用钱财去行贿上司，而要想升官，那就好像是用猫作诱饵去引诱老鼠，必然是没有希望的；如果用诚实服侍上司来谋求升官，那就好像是拉着断了的墨线而去取直弯曲的木料一样，更加没有希望的了。这两种办法都不能达到升官的目的，那我怎能不向下面盘剥民众，勒索钱财去行贿上司来争取升官呢？”老百姓说：“我尽力耕作，首先装满了国家的粮仓，然后收藏剩余的粮食来养活父母；为国君主还舍生忘死地去作战，以便使君主尊贵、使国家安全。但结果是国家的粮仓空虚，国君的地位下降，自己的家也贫穷。这样的话，那还不如去求个官做。”亲戚朋友意见相同，那就会

改变原来务农的主意了。才能出众的人就会努力学习《诗》、《书》，投靠外国的势力寻求做官；微不足道的平凡小人物就会去经商，搞手工业，都靠这些行当来逃避农战。如果民众以这些人的行为作为榜样，那么粮食怎能不减少，而兵力怎能不削弱呢？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任用官吏的制度严明，所以不用智谋，国君只要专一注重农战，民众就不会弃农而谋求其他的行业，这样，国家的力量就能集中了。国家的力量集中，就强盛；国内处处崇尚巧言空谈，国家就会衰弱。所以说：从事农战的人有一千个，但如果出现一个嗜读《诗》、《书》而又是善钻营巧论辩的人，那么这一千个人对农战就都会懈怠了。从事农战的人有一百个，但如果出现一个搞手工业的人，那么这一百个人对农战就都会怠慢了。国家依靠农战才能安定，国君依靠农战才能尊贵。民众所以不去从事农战，是因为国君喜欢巧辩空谈而任用官吏时违背丢了常规。按照常规来任用官吏，那么国家就会治得好；专心一意于农战，那么国家就富强。国家富强而又治理得好，这是称王天下的必由之路。所以说：称王天下的必由之路，只在于国君本身专一于农战罢了。

现在国君只选择人们的才能智慧去任用官吏，那么脑筋活的人就会观望国君的喜好憎恶，擅用职权，裁决政务以迎合国君的心意。这是因为任用官吏没有常规，国家任用官吏混乱是政策没有统一，况且善辩游说的人又目无法度。像这样，民众所响往的职业怎能不多？而耕地怎能不荒芜？《诗》、《书》、礼制、音乐、慈善、修养、仁爱、廉洁、辩论、智慧，国家有了这十种东西，那么君主就无法使民众守土和作战了。国家用这十种东西来治理国

家，敌人来攻必然会丧失国土；敌人不来侵犯国家也必定会贫穷。国家废除了这十种东西，那么敌人就不敢来侵犯，即使来了也一定会被打退；如果出兵征战别国，一定能夺得别国的领土；如果按兵不动，国家也一定能富足。崇尚实力的国家就是用农战所取得的实力去攻打别国，用农战所取得的实力去攻打别国的国家必定兴盛；而喜欢巧辩空谈的国家却用容易得到的东西去攻打别国，用容易得到的东西去攻打别国的国家必定危亡。所以神通的伟人，英明的君主，并不是完全懂得万物，而只是懂得万物的要领。所以他们治理国家，不过是考察万物万物的要领罢了。

现在治国的人多数不掌握要领。在朝廷上议论治国的办法时，都乱哄哄地想以自己的观点改变对方的主张。因此，那国君就被种种说法闹糊涂了，那官吏就被众多言论迷惑得晕头转向，那民众也懒得想干农活了。所以那国内的民众，都变得喜好巧辩空谈、乐意学习《诗》、《书》儒家学说，积极从事商业，干手工业，以此逃避农战。象这样，那么离亡国也就不远了。国家一旦出了事，那么学士憎恶法度，商人见利行事，手艺人无所用，所以国家就容易被敌人攻破而亡。因为务农的人少而游逛混吃的人多，所以国家就贫穷危险。如今那些螟虫、蝗虫、青虫等害虫，春天出生，到秋天就死了，但只要虫灾出现一次，民众就会几年吃不上饭。现在一个人种地而一百个人等着吃他种出来的粮食，这些寄生虫如果与螟虫、蝗虫、青虫之类相比，那危害也就更大了。这样的话，即使有了《诗》、《书》，每乡一捆，每家一卷，对于治国还是毫无益处的。因为这并不是用来转贫为富、转危为安的办法。所以，过去有作为的帝王都以重农战来作为转贫为富、转危为安的办

法。所以说：一百个人务农而一个人闲居的国家就能成就王业，十个人务农而一个人闲居的国家就强盛，一半人务农而一半人不干活而闲吃的国家就危险。所以治国的国君总是希望民众务农。国家如果不注重农业，那么在和诸侯争夺霸权时就不能保护住自己，这是因为民众的实力不够啊。所以，如果别的诸侯国抓住它的软弱来侵扰它，趁它的衰微来进攻，那么领土就会被侵占割削而国家也就一蹶不振了，到那个时候用什么办法也来不及了。

英明的国君知道治国的要领，所以让民众安心务农。民众安心务农，那就朴实而可以被治理，忠厚而容易役使，真诚而可以用来守土攻战。民众专心于农战，那就少有欺诈而看重故居不愿迁徙；民众专心于农战，那就可以用奖赏和刑罚来激励他们；民众专心于农战，那就可以在对外作战时利用他们。民众之所以能亲信国君而为法令去牺牲，是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在田里耕作。民众之所以不听使用，是因为他们看到油嘴滑舌的四处游荡的说客去侍奉国君可以使自己得到尊贵的地位、商人经商可以发家致富、手艺人做手艺也足够用来糊口了。民众看到这三种职业既简便又有利可图，那么必定会想办法逃避农战了。要逃避务农，那么民众就会轻视自己的故居。轻视自己的故居，那就必定不会为国君守土作战了。凡是治国的人，都怕民众从田里流离四散而不能集中，因此圣人实行重农重战一个政策，这是为了把民众集中起来。国家专心于农战一年，就会强盛十年；专心于农战十年，就会强盛一百年；专心于农战一百年，就会强盛一千年；强盛一千年的国家就会称王于天下了。君主制定赏罚制度来辅助以民众专心于农战的教育，因此国君的教育有常规，而政治就有了成绩。

称王天下的君主须掌握了统治民众的最根本的关键，所以不等实施赏赐而民众就亲信国君了，不等封爵授禄而民众就尽力农战了，不等使用刑罚而民众就勇于牺牲了。当国家危急、国君忧虑发愁的时候，油嘴滑舌的人即使三五成群，对国家的安危丝毫也没有用。国家危急、国君发愁的原因，是因为面临强敌大国的威胁。国君如果不能去制服强敌、打败大国，那就要修整防守的设备，考查熟悉地形，集中民间的人力物力，来对付外来的入侵，然后祸患才可以消除，而称王天下的目的才可以实现。因此英明的国君改革政治而实行一个重农重战的政策，去掉没用的东西，禁止民众学习浮夸不切实际的学问和到处游荡无所事事，让民众专一于农战，然后国家才可以富足，而民众的力量才可以集中。

现在社会上的各国国君都忧虑自己国家的危亡和兵力的薄弱，却硬要喜欢听信游说人的话，说客们队伍成排，他们絮絮叨叨、花言巧语，但毫无实际用处。国君喜好他们的辩说，竟然不去探求这些辩说

的实际效用。所以说客们就得意了，在街头巷尾邪词歪理的诡辩，一帮帮地成群结伙。人民群众看到他们可以用这种手段来取得王公大人的欢心而捞到高官厚禄，就都跟着他们那样学。这些人聚集同党伙伴，在国内高谈阔论，搞得处处乱哄哄的，平民百姓乐意这样，达官贵人也爱好这样。所以国内的民众务农的少了而靠游说来混饭吃的人多了。靠游说来混饭吃的人多了，那么务农的人就懈怠了；务农的人懈怠了，那么土地就会荒芜。仿学说客成了风气，那么民众就会抛弃农耕去从事辩说，高谈阔论、说大话讲假话。民众抛弃了农业、靠游说混饭吃、并以空谈来互争高低，所以背离国君而不服从法令的人就多得成群。这是使国家贫穷、兵力薄弱的教训啊。国家如果凭能言善辩来任用人，那么民众就不会喜欢务农了。只有英明的国君才知道喜好空谈是不能够用它来增强兵力、开辟疆土的，只有圣人治理国家才能够专一农战、把民众集中到务农上来。